

宜 阳 纪 事

邵 文 杰

一、去 宜 阳

1938年7月上旬，豫西特委的一个交通员来新安，先见到县委书记郭升允，然后和郭一块到我家。他们通知我，豫西特委决定调我到特委去工作。我欣然接受。于是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就去报到。当时豫西特委驻 洛 阳，特委书记刘子久，副书记王志杰兼组织和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是郭晓棠，秘书长是席国光（当时化名纪西）。根据交通员告诉我的联系方法，到洛阳后先去河洛中学找到赵文甫同志（当时名叫赵文渊）。他在学校的传达室里接见我。开始，传达室只有我们两个人，以后又陆续进来两三个人。他们互相之间很熟识，坐下来随便地谈着话。他们也和我打过招呼，不时地问我一些话。但他们都没问我的名字，赵也不介绍。当时我认为他们也是学校的几个教员，所以我谈话时也很谨慎。后来时间长了，才知道他们都是豫西特委的领导同志。他们大概是有意识地来看看我，过一会儿都走了。文甫同志交给我一个纸条，叫我去住一个旅馆。他告诉我：“你住到那里，明天有人去找你。你只管住，不要付房间钱。”

旅馆地点在城西北的一条背街上，是一个比较高级的旅

馆，派头较大，房间也比较阔气。我把纸条交给旅馆我要找的人以后，他热情地把我安置在靠后院的一个单独房间里。

第二天，特委派陈耳东同志和我谈话，并研究了我的工作。他问我：“做学生工作合适呢，还是做农村工作合适？”我说：“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听从党的分配。不管哪种工作，我都没有经验。”

第三天，陈耳东同志又来了，说特委决定派我到宜阳县帮助工作。他介绍宜阳的情况时说，宜阳县已经有70多名党员，有支部，但区、县组织都没有，要我去宜阳把党的县、区组织建立起来，并帮助他们工作。每过十天半月，回洛阳向特委汇报一次。

耳东同志临去时，交给我一封党的介绍信，要我到宜阳东赵保找张剑石同志。另外交给我一张十元的国民党“法币”，说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以后每月给我十元生活费。并要我回洛阳时还住那个旅馆。看来那个旅馆和我地下党有密切关系。

在旅馆里住的，除我以外都是些有钱的人物。吃饭的时候，大饭馆我吃不起，在小饭铺吃饭，又怕同旅馆的人发现引起对我的怀疑，我只好在附近的小饭摊上买几个烧饼，拿回旅馆背着屋门就开水吃。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我挎着一个只有两件单衣的小包袱到宜阳去。宜阳县城距洛阳城70华里，东赵保离宜阳城还有30华里。我没有去过宜阳，一面走一面问，才知道去宜阳有两条路。一条在洛河北是公路，没汽车；一条在洛河南是小路。小路近，所以我走的是小路。因为天热走30来里以后就感到口渴，遇到小河就喝几口凉水，但一出汗，不一会儿

又渴了。中午时又感到饿，但遇不到卖吃的，一直走到下午大约两三点钟的时候，才遇到一个小饭铺。这个饭铺只卖面条，7分钱一碗。我拿出十元的票子，想买两碗面条吃，但店主人找不开。怎么办？我掏掏口袋，只剩6分钱了，就和店主人商量：“掌柜的，除这一张票子外，我只剩这六分钱了，你就卖给我6分钱的面可以吗？”店主人约30来岁，像个朴实的农民，他看我风尘仆仆的样子，态度和蔼地说：“可以。”“我渴得很，先让我喝点面汤好吗？”“随便喝吧，没有关系。”我渴极了，喝了一碗又一碗，一连喝了六碗面汤，这才压住渴了。然后吃了六分钱的面。临走时，我一再向店主人道谢。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永远也忘不了。

因为过去没有走过这样远的路，鞋子也有点不很合脚，脚上打了几个泡，越走越疼，因而也越走越慢。走到宜阳城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我找了一个饭铺住下，买饭时铺子里仍然找不开我的十元钞票。我到街上去换钱，但小铺子里都换不开。后来找到一个大布店，请他们换，他们说可以换，但得打折扣，十元钱只能换九元五角。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只好换了。

在饭铺里过夜很简单，就在营业屋子中间铺一条苇席，别的什么也没有。这倒便宜，住一夜的房钱只一个大铜板（20文）。

第二天动身去东赵保，出西城门顺着山沟走，然后翻山到赵保。虽只30里路，但因我脚上打泡，路又不好走，所以走起路来更困难了。中午以前，终于到了东赵保，并顺利地见到张剑石同志。

二、恢复宜阳县委

张剑石同志向我详细介绍了宜阳地区党的情况。1930年前后宜阳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1933年前后，有党员数十人，主要分布在赵保、韩城、水沟庙等地。1933年11月，县委书记王希治等人被捕，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以后河南省委被破坏，长期没有恢复起来，所以宜阳剩下的党员没法和上级党取得联系。但有些党员还继续进行着革命活动。在这种白色恐怖下，张剑石同志又回到宜阳。这时他已和豫西特委取得了联系，在豫西特委的指示下，回宜阳进行恢复和发展党的工作。1938年7月，我到宜阳去时，党已恢复和发展到70余人了，但没有统一的组织，不便开展工作。我和张剑石同志商量，根据特委指示，为了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应该把县区领导机构建立起来，剑石同志当然是同意的，还找了几位同志酝酿了一次。因为宜阳的党员，赵保地区最多，为了领导方便，我们认为县委以设在东赵保为宜。

一天晚上，在张达人同志家的后院召开了党员会议，到会20来个党员。会上我传达了豫西特委的指示和我与张剑石等同志酝酿的意见，经过大家讨论，都同意了。会议通过选举，成立了县委会，由张剑石同志任县委书记。

县委成立后，我和剑石就在韩城、水沟庙、柳泉和段村等处检查工作。这时候韩城有十几个党员，水沟庙有七八个党员，段村有四个党员，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有党支部，经过研究，把各区区委也建立了起来。一区区委在东赵保，二区区委在段村，三区区委在韩城，四区区委在水沟庙，都是由老党员任区委书记。

除建立党的领导机构外，还研究了工作。当时的主要工作任务有两个：一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向群众宣传抗日，巧妙地宣传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各项政策；二是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

宜阳的特点，一是老党员占多数，二是农民党员占绝大多数。因此，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基础比较好，但是，知识分子成分的党员太少了，学校这个重要阵地还基本没有占领。所以在发展党的工作中，除继续在农村发展党员外，还注意在学校中建党。

三、三 乡 会 议

1938年8月下旬，我从确山竹沟党训班学习回到洛阳后，特委派我继续到宜阳帮助工作。9月上旬，接特委通知到宜阳三乡参加会议。

三乡是宜阳县最西部的一个镇子，是宜阳和洛宁之间的一个小经济中心。镇上有五百来户人家，街上有饭铺、药房等商店，逢集时四乡许多人来赶集，很热闹。街东头有一所完全小学，镇子四周有寨墙。

当时三乡党员只有王凤照同志，没有支部，地方条件并不好。特委所以选择三乡开会，原因是三乡地处宜阳、洛宁之间，比较适中。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三乡驻有国民党的冀察游击纵队（司令孙殿英，1939年该部队改为新五军）的教导队，教导队里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政治教官多是共产党员，非党员中也有许多同情共产党的人，在这里开会，他们可以起很好的掩护作用。

会议是豫西特委直接领导的，特委的主要负责人刘子

久、王志杰和郭晓棠等同志都参加了。其他有洛宁、宜阳、新安和教导队的负责同志，共20多人。我能记得的有：洛宁县委书记韩达生和县委其他负责人曲乃生、贺崇升等同志，新安县委书记王文长和县委其他负责人李之放等同志，宜阳县委书记张剑石同志和教导队党的负责人。

会议是在一个祠堂里开的。这个祠堂座落在三乡镇北部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四周都没有人家。祠堂座西向东有三间整齐的大殿，殿前有一个长着数株古柏的相当幽雅的院落。在教导队的掩护下，在这个祠堂里开会，是最安全不过了。

会议上大家向特委汇报了工作，并在特委的直接领导下，研究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工作。特委负责同志对工作作了许多指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以及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在组织问题上，特委宣布成立“洛宁中心县委”，成员是韩达生、邵文杰、曲乃生、贺崇升、李之放、王文长、张剑石和教导队的一位同志。韩达生任中心县委书记，我任组织部长兼宜阳县委书记，曲乃生任宣传部长，贺崇升任统战部长，教导队的同志任军事部长。

会议开了四五天。这次会议是几个县建党史上很重要的一次会议。会议以后，各县的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党在群众中的工作更加深入了，党在社会上的影响更大了。

四、党在宜阳大发展

从1938年9月洛宁中心县委成立到1939年上半年，是党在宜阳的大发展时期。全县党员已达到400人，有4个区委，

23个党支部。除农民党员仍占绝大多数外，已占领了许多学校阵地，县立师范和城关、东赵保、柳泉、寻村、韩城、盐坡头（盐镇）等完全小学，都建立了党支部，水沟庙、耿沟、留村、黄窑等初级小学，也有共产党员。除在教师中发展一些党员外，在学生中也发展了一些党员。有农村支部的地方，主要是东赵保、段村、寻村、柳泉、官庄、水沟庙、南村、三乡、王眷等地。

随着党的发展，党在群众中的工作也越来越普遍地展开了，主要是宣传抗日，宣传党的主张和向反动人物进行斗争。党是通过这些工作发展壮大的，反过来，随着党的发展壮大又推进了这些工作。

五、党在孙殿英部队里

国民党的新五军军长孙殿英靠拉土匪起家，后来投奔军阀，朝秦暮楚，谁给钱多，谁给官大，就给谁干。蒋介石吞并异己中把他收买过来，抗日战争开始后编为冀察游击纵队，后改为新五军。

孙殿英的部队在抗日战争以前，一向是一支腐化堕落、土匪成性的队伍。他的官兵很多人吸毒品。群众说孙殿英的兵每人有两支枪，一支是步枪，一支是大烟枪。在他的部队里，吸毒品是公开合法的。他的部队不仅吸食毒品，而且大量制造毒品。他们制出的毒品，除自己吸食外，还向社会出卖，以增加他们的财政收入。

孙殿英还有一个“本领”是赌博，他对麻将牌的识别能力特别强，一副新麻将牌，只要他打过两圈，就能将一百多张牌从背面认出来。因此他赌博赢的次数最多。和他赌博的

都是些很有钱的军阀、官僚，他常赢很多钱。赌博赢钱也是他的财政来源之一。因为他的部队很多人是土匪成性，所以抢劫人民财物更是经常的事。

孙殿英还有一个社会基础，就是利用封建迷信的庙道会来扩大他的势力。豫西的庙道会是很普遍的。特别是洛阳、宜阳、新安县一带，很多村镇都有庙道会组织，而且人数很多。孙殿英为了利用庙道会，他自己也参加了庙道会，他的官兵，大多数是庙道会员。部队里公开设“香堂”，定期烧香聚会敬“张天师”。并借所谓“口”（似巫）传达神谕，以欺骗士兵。他也经常从社会上动员一些庙道会员参加他的部队。

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又想利用共产党来扩大他的势力。我们党为了抗日，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派了一些共产党员到他的部队去（不公开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现）。党在该部的工作做得很好。前面说过，宜阳三乡镇驻有孙部一个教导队，这个教导队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对学员很注意革命的政治教育，这是按着党的指示进行的。教导队有几百人，主要是周围各县地方党组织介绍来的知识青年。

柳泉驻有孙部的政训处。政训处里的政治教官，多数都是共产党员，有的是思想进步，在政训处加入了共产党。1945年渑池上官子平事变中牺牲的王舟平同志（当时是渑池县委书记）和曾任河南省委秘书长的苗化铭同志，1938年就在该政训处任政治教官。在政训处的同志们，除做部队的政治工作外，还配合地方党的组织进行社会宣传工作。政训处组织有一个儿童宣传队，许多儿童是从东北流亡过来的。这个儿童宣传队经常给群众演爱国戏剧，并在街头做口头宣传。他

们还实行“小先生制”，由他们宣传给社会上的儿童，再由社会上的儿童回家向父母们作宣传。

孙部还有一个宣传队，也是共产党领导的，经常在赵保和韩城等地作宣传。我党在孙部的政治宣传工作，对部队和社会上都有很大影响。

1939年2月，教导队被调到黄河北。后来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政治形势越来越坏，孙殿英也更坏了，我党在孙部的党员大部撤出。党在驻宜阳孙部的工作，是由豫西特委（后改为豫西省委）直接领导的。

1943年，孙殿英率部投降日寇。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又任命他为第三纵队司令，坚决反共。1947年4月，我军在汤阴县将他的部队消灭，把他孙俘虏，不久病死。

六、东赵保农民训练班

1938年7月，我在宜阳县东赵保时，由张剑石同志发起，在东赵保组织了一个农民训练班，四五十人，其主要成分是思想进步的年轻的贫苦农民，也有一些进步知识青年。其中有一些是共产党员。

教员只有两个，就是张剑石同志和我。张剑石同志要我讲游击战术，在当时国民党节节败退，日军侵占主要城镇的形势下，学点游击战术是很有必要的。我没有打过仗，更没有打过游击战，我对游击战术一点经验也没有。但是讲这门课又找不来有经验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颇不自量地承担了起来。

我出来工作，总是带几本马列主义的书籍。恰好这时我带有毛主席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登在八路军杂志

上)，我摘要地编成讲义，交张剑石同志设法油印出来发给大家，我就据此向大家讲解。虽然是纸上谈兵，但对大家却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当时在国民党地区，不能在公开场合提毛主席的名字，以免地下党暴露。但当我说明这些讲义是多年游击战争的总结时，大家也就明白讲义内容的来源了。

当时地下党是注意掌握武装的，就赵保来说，党就掌握有一些枪支。后来，经赵保全体党员在群众中做工作，拥护张剑石同志当上了赵保寨务主任。1939年，又通过社会关系，使一个共产党员当上了赵保联保主任。这就使党能够更多地掌握赵保的武装。在这种情况下，赵保实际上成为共产党掌握的赵保。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志在东赵保南边和当地的同志开会，开会时有的同志就带着驳壳枪。开完会后，夜已深了，根据东赵保的惯例，夜间是要闭寨门的。但我们毫不在乎，当我们回来走到西寨门前时，一个同志向寨门楼上掷了一块小石头，不久，寨门就开了。原来守寨门的就是共产党员张须同志。还有一次，我们就在东赵保正当街的炮楼上开党的会议，一连开了两三天，我吃住都在炮楼上。开会时桌子上就放着驳壳枪，可见党在赵保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我们打算把赵保一带建设成为一个堡垒，一旦豫西沦陷，就可以作为强大的抗日根据地。农民训练班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办的。

1944年4月，日寇使用兵力近十万人发动河南战役，国民党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部40万大军望风披靡，郑州、洛阳等三十八个市、县相继陷落。在此情况下，八路军从华北打过黄河，直插敌后，建立了几块根据地，扩大了游击区，其中的伊洛分区，就是以赵保一带为中心的。

七、澠池会议

1938年12月中旬末，中心县委书记韩达生同志约我到澠池开会，究竟开什么会他也不知道，只是说豫西特委通知去开会。除我们两人外，还有贺崇升、曲乃生、张剑石、李之放、王文长等同志。各县负责同志是分头到澠池的。那时候澠池东关设有一个八路军兵站（公开的），负责和华北八路军的联系。组织上约定我们先到兵站。走到澠池火车站时，暮色已苍茫了，各处灯火明明灭灭。澠池北60里有一个南村渡口，是黄河上的一个大渡口。南村和澠池县城之间是大山区，处处是高山深壑，但盘山有一条公路相通。从南村渡过黄河，就是山西省的垣曲县，从这里通中条山，也通太行山。因此，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澠南公路和南村渡口成为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但这主要是国民党和它在山西部队的联系和运送军用物资的主要通道，八路军所以也在这里设个兵站，除运送一些物资外，还经常通过这里向华北八路军派送一些革命知识青年。因此，澠池火车站和东关一带显得特别热闹，虽然天已昏黑，仍是人声嘈杂，马嘶车鸣。

我和达生同志到八路军兵站后，由兵站的一位同志领着我们穿过大街，经过一个小巷，到北边旷野的地方。向东走了一小段路，从一家后墙的缺口翻了过去，到一处三间打通的窑洞里。当天晚上人都到齐了，约30余人，豫西特委的刘子久、王志杰、纪西（即席国光）、郭晓棠、吴祖贻、王吉仁同志都到了。当时，豫西特委下面有五个中心县委，各中心县委负责人和各县委书记差不多都来了，我能记得的有贺崇升、曲乃生、张剑石、李之放、王文长、刘道安、蔡迈轮、

关周光、陈耳东同志，还有危拱之、吴平等几位女同志，另有从其它地方来的同志。

特委通知，为了保密和安全，我们来开会的同志只可以在这个后院走动，不能外出。我们都住在这三间窑洞里，吃饭有人送。30多个人住在这三间不大的窑洞里是很挤的。窑洞内没有床，地上铺些谷草，几个人一条被子挤着睡。几个女同志挤睡在一个窑洞的壁龛里。大家在一块过得很快活，真象一个融洽和睦的大家庭。

第二天开会，会址也就是这个窑洞，迎门的地方放了一张桌子，两个凳子，参加会议的人都席地而坐。大约上午八点钟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没有手表），刘子久同志陪着一位穿灰色制服的同志进来了，看样子他的年令不超过40岁。他坐在桌子的正面，刘子久同志打横坐着。子久同志主持会议，他向我们介绍说：“这是胡服同志，是从党中央来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内容的。”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同志。由于刘少奇同志长期做白区工作，就是刘少奇这个名字，当时地下党的党员也很少有人知道。因为他是党中央派来的，大家都很尊敬他。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1938年10月到11月在延安召开的，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少奇同志传达的主要内容是毛主席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在全会上作的结论。此外，还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著作《论持久战》。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个问题，为使全党同志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我们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毛主

席在结论中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毛主席的报告、结论和《论持久战》，都有铅印文件。

传达后分组讨论，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争着发言，晚上还在煤油灯下一直讨论到深夜。因为天气冷，没有火，开会时大家都围着被子，但大家都毫无睡意，就是熄灯睡觉了，有些同志也还轻声交谈着、争论着。毛主席的报告、结论、《论持久战》和六中全会决议，象阳光一样照亮了中国的前途，照亮了每个人的心。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受到很大教育，思想认识、政治觉悟提高了，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明确，对做好地下党工作信心更足。

分组学习讨论后，在子久同志主持下，由各中心县委和县委负责同志依次向刘少奇同志汇报了各地区的工作情况。汇报时，少奇同志不时地发问和作一些工作上的指示。他讲话时，稍带苍白的脸上总是带着严肃认真与和蔼可亲的神态。他听完汇报后，对豫西地下党的工作又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在这次会议上，根据中央指示，将豫西特委改为豫西省委，豫南特委也改为豫鄂边区党委，撤销了原河南省委的建制。

会议大约开了五 六 天。这次会议对豫西地下党工作的开展起了决定性作用。会后豫西省委利用渑池八路军兵站这个有利条件，举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由郭晓棠同志负责。训练班结束后，我又到渑池去了一趟，郭晓棠同志交给我数十本油印的训练班上用的教材。晚上我在渑池火车站等车去新安。这是1939年二 三 月 间，天气很冷，等车的人都挤在

车站附近的几个饭铺里，我也提着一大包教材在一个饭铺里等车。大家把行李放了一大堆，我也把这一包教材放在行李堆上。我站得远远的，一会儿，有几个国民党军警来检查，他们问问这个，问问那个，也问到了我。“你是干什么的？”

“教员。”“哪里去？”“洛阳。”“带行李了吗？”“没有。”为了证实我是不是教员，有一个家伙还考问了几个文法上的句子。看来这家伙倒读过几天书。当我随口答复了他的问话后，他才走开。

当火车将要进站时，候车的人一哄而起地争着拿行李到站台上，我也趁这个乱劲提着教材进站了。在火车上，我把教材放在车厢一头的行李架上，坐在另一头。这是防备国民党在车上检查，如若检查出这包教材，我就不承认是我的。但一直到新安车站并无人检查，我安全地到了住处。

八、地委党训班

1939年8月，根据豫西省委指示，在宜阳县寻村北岭上的王坑村办了一期洛宁地委全区性的党员训练班。王坑是在北岭上的一条沟里，很偏僻，大概有10户左右人家。这村里有个人叫王益三，是由他安排的住处。

这次党训班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党的支部书记。学员是从洛宁、宜阳、新安三县挑选的比较好的党员或现任支部书记，共30人上下。该训练班主要由省委宣传部长郭晓棠同志主持，我协助他。

和渑池会议时差不多，我们大家都住在一套两孔相通的窑洞里。不过在渑池住的是一家地主的比较讲究的砖拱窑洞，这里是破烂的土窑洞。王益三弄了一些麦秸作铺的。吃

饭由组织上拿钱交给王益三，请益三家做好送来。虽说这地方很偏僻，村子里也没有坏人，但为了谨慎，在休息时间，大家都不在村子里随便走动。

学习内容主要是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郭晓棠同志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主要根据陈云同志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讲党的建设。讲解和讨论相结合，共学习了一个月。

学习后大家仍回到原来的地方工作。这次党训班在洛宁地委的建党工作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九、灵山的工人党支部

灵山在宜阳城西15里，象一把高大的扇子屹立在洛河之滨。山上长满了柏树，郁郁葱葱。山麓有一个大寺院，名曰灵山寺。寺内有一清泉，淙淙外流。佛像虽已破落，大形犹存。门前渡船往返，林中鸟语啁啾，朝辉晚霞掩映之时，更增加了灵山的景色。

此地历来是香火盛地，每年春季的庙会长达半月之久，有数十县的善男信女来此烧香拜佛。白天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烟云缭绕，清风飘香；夜间经声嘹亮，林宿远客，月洒银光。通过每年一次这样的庙会，和尚们就大大增加了香火钱的收入。

1938年，这里起了很大变化，这个大寺院变成一座工厂。它的来历是这样的，当日军占领豫北和豫东地区时，郑州受到了威胁，国民党和资本家疏散郑州某些工厂。当时郑州最大的工厂豫丰纱厂（其实只有三万纱锭、几百台织布机）被迁到四川，但有一部分工人（主要是家属）坚决不愿去，

厂内的共产党组织支持他们的行动，国民党和资本家不得已，搞了一部分手工织布机，在宜阳灵山寺办了一个小工厂，起名“建成”工厂，共有男女工人一百多人。厂内的共产党支部有21名党员，支部书记岳鸿祥，副书记郭长福。

1938年秋天，豫西特委给我一封介绍信，要我和灵山党支部取得联系，并决定该支部归宜阳县委领导。我当时是用“邵含洲”这个化名和他们联系的。从1938年到1940年4月，我多次到灵山支部去，参加过他们的几次支部会，传达中央和特委、省委指示，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和研究布置工作。

灵山支部是洛宁地委唯一的工人支部。他们的工作做得很细，全厂工人都团结在支部的周围。

该厂工人生活很苦，每天上班20个小时，一个月休息三天，成年工人每天工资约五角，童工约三角，产妇只能休息一个月。此外，有些女工还经常受经理的打骂和污辱。

1939年3月，因经理袁某打骂工人、调戏女工等事，我党支部书记出来反对，被袁开除，于是爆发了全厂的反袁斗争，赶走了袁，并迫使厂方收回被开除的人。

十、赵保中学事件

1938年以前，赵保没有中学，1939年上半年，经过张剑石同志活动，得到国民党县教育局的同意，并经国民党河南省教育厅批准，成立了“宜阳师范附中东赵分校”，由县教育局任命张剑石同志为分校主任，下半年开始招了一班学生，聘请共产党员朱子温、徐素仁（徐文华、女）、张新民、张兆汉等在该校任教。1940年2月，河南省委调赵文甫

同志到该校任教导主任。他们在这个学校，除教一般课程外，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特别是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各项政策，把赵保中学办成了一个红色学校，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赵保的反革命分子和顽固势力，对张剑石同志和其他革命教师非常仇恨。为了避免国民党的迫害，1940年2月，省委调张剑石同志到豫东敌后去了。但赵保那些顽固派们仍不放过这个学校，他们勾结国民党县当局进行破坏。1940年3月9日，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庞一民和县教育局局长王玄冰一起，带着十几个武装人员，杀气腾腾地扑向东赵保，大约在上午11点钟的时候，庞一民领着人闯进学校。赵文甫同志看到形势不对，一面应付着敌人，一面暗示其他党员同志速速隐蔽。敌人一面询问，一面搜查，还盘问一些同学。但只搜查出一些马列主义书籍。一直闹腾到下午三四点钟，最后把赵文甫同志带到联保处。在联保处停留了很短时间，便强迫赵骑上马同赴县城。

党在赵保的工作很有基础。当党员、群众知道赵文甫同志被捕并要带进县城时，就积极采用多种办法进行营救。赵被带到北寨门附近时，有二三十个中学学生赶来，阻住了敌人的去路，接着校董会的一些人及许多群众也都哄哄嚷嚷地集拢过来，将敌人包围得水泄不通。大家喊口号，质问敌人，不管敌人怎么说，就是不让把赵带走。地下党同志又动员校董张祥英等约同寨务委员马会都去作保。张新民同志还催促当时是共产党员的联保主任王玉珍出面说合。这时太阳已大偏西了，赵保离县城有30里路，而且多是山路，庞等带人走，路上得搭黑。他们过去也知道，赵保的群众不是好惹的，今天